



汉魏以来之泥冥钱

陆锡兴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泥冥钱在战国楚墓、西汉墓葬常有发现,制作精致,具有一定数量,是当时流行的随葬品。东汉,主要在东汉前期,楚国遗风的郢金泥版、秦风的泥半两早已消失,只有泥金饼和泥五铢钱两种,这个时期无论泥钱出现的几率或者制作质量都大幅度下降。东汉时期废弃了以前那种规模宏大、陪葬丰富的木椁墓葬,转而把财力花在采用石料,构造精美的画像石墓。泥钱很可能随着这种习惯改变而渐趋式微,因此东汉泥冥钱的衰落主要是丧葬风俗变易决定的。纸张的发明和使用对中国文化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却是泥冥钱消失的主要原因,人们采用更加便于处理的纸张,最终取代了泥土。但是泥冥钱不是一下子退出历史舞台,它与纸钱存在以一个交叠的使用期限,这个时间长达几百年。

纸张使用首先影响了书写材料的革新,东汉以前主要书写材料是竹木制作的简牍,这点从各地考古出土的战国、汉代文书得到证明。简牍的竹木硬质材料有很大的缺点,加工麻烦,体积大,分量重,不便使用。丝帛虽然轻便柔软,质轻光滑,但是昂贵之物,不可能广泛使用。先民由飘絮得到启发,利用植物纤维制造纸张。考古发现的汉代的纸张实物越来越多,按照年代排列: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现了8片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初年的西汉前期麻纸,1979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发现西汉文景时期的纸质地图,1957年陕西西安灞桥发现西汉武帝前的麻纸,1973年在额济纳河金关遗址发现2片西汉后期麻纸,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西汉窖藏内清理出西汉宣帝时麻纸,1933年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发现宣帝黄龙元年(前49年)前后麻纸,1937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查科尔帖汉代烽燧遗址发现东汉前期古纸。以上的古纸经过打碎、扫化,基本符合纸张工艺的要求。1990年至1992年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陆续发现麻纸460件,为黑色、褐色、白色、黄色,均有厚、薄两种,有字者多为白色和黄色纸。纸张用纸质麻纤维和丝

纤维制作,用于书写者较厚,但光滑细腻,用于包装者质地较粗糙。纸质文献发现了10件,只有一件属西晋,其余皆为汉代。根据同层位简牍的年代,纸质文书可分三个时期:西汉武帝、昭帝时期3件,纸白,粗糙不平整,各书药名“付子”“细辛”“薰力”,为包药纸;西汉宣帝至成帝4件,黄色间白,质地细而薄,有韧性,平整光滑;宣帝时有纸书草书2行;东汉初纸2件,质地疏松,1件有隶书2行,西晋纸1件,质地细密,均匀,光滑有韧性,残存7行31字,是尺牍。《后汉书·宦者传》载:蔡伦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在元兴元年(105年)奏上,“自是莫不从用焉”。蔡伦的功绩在于改进造纸工艺,让纸张达到书写材料的要求,并且自上而下地推广,使得纸张成为官方正式认可的书写材料。

简牍用作书写材料历经很长的历史时期,其坚固、便于加工,长期形成的习惯,并没有在东汉中期纸张正式使用后立即消失。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年号最早为三国魏景元4年(263年),最晚为西晋建兴18年(330年),后者已经进入前凉时期,在武威汉墓出土了咸康4年(338年)、建兴43年(355年)、建兴48年(360年)木牍。武威松树乡下旱滩坡19号墓夫妻合葬,出土木牍5件,4枚在男棺、1枚在女棺,衣物疏木方2枚,男棺女棺各1枚,名刺3枚。有咸康4年(338年)、建兴43年(355年)、建兴44年(356年)、建兴48年(360年)、升平13年(369年)纪年,皆十六国前凉时期。

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4号墓出土绢书残片,5号古墓出土前凉升平13年(369年)的衣物疏木方。

马雍说:“吐鲁番出土的‘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券’仍写在木简上,表明西晋前期,此地民间用简牍而不使用纸张。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我们可以用罗布淖尔地区所发现的文书作为对比,在罗布淖尔楼兰遗址所见西晋泰始年间的文书几乎全都是用简牍书写的,而属于前凉张骏时期的李柏文书则写在

纸上。可见,在高昌、楼兰这一带地方,纸张之取代简牍即发生在西晋末年至前凉初年”。南方地区地气潮湿,虽然保存的条件不如干燥的西北好,可是魏晋以来的简牍发现不少,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数量惊人的三国吴简、郴州出土东晋简,湖北、安徽、江西陆续出土三国吴和东晋的简牍,但是没有更晚的简牍发现。以目前吐鲁番发现的简牍,迟至前凉后期,因此纸张全面取代简牍,至少在前凉后期。

如果说广义纸张出现到简牍废止,从西汉文景时期到前凉是五个多世纪,从官方推行纸张的元兴元年(105年)到简牍废止也要在二个世纪以上,两者交接期集中在西晋后期到前凉后期的数十年间。比较而言,泥钱与纸钱的更迭过程复杂,时间更长。现见的西汉纸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日用纸,用于包裹等杂用,纸质粗糙,纸质要求低。另一种是书写纸,表面光洁、洁白,纸质要求高。纸钱本质属于日用纸,没有书写纸这样高的要求,民间通常如此,采用白藤纸之类的好纸,是奢侈的消费。单单从材料上说,似乎纸钱产生要容易,只要有纸就可能出现纸钱,事实并非如此,纸钱比纸文书出现晚得多。

至今的考古发现,在东汉以后才能有到成篇的纸质文献,纸张进入社会真正作为日杂用品,可能在东汉之后。传说是南朝齐东昏侯始作纸钱,到底始于何时难以彻底查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吐鲁番阿斯塔那521、522号墓是同时代的高昌墓葬,522号墓出土麴氏高昌建昌2年(556年)的墓志,那么521号墓的年代相近,其墓内发现了纸钱。麴氏高昌前期相当南朝梁陈之间,由此推测,所谓南齐东昏侯剪纸为钱之事是有可能的。阿斯塔那521号墓年代明确,墓内纸钱是现见最早的发现。本文以高昌建昌二年(556年)为基点,观察前后的泥钱情况,其上限放在魏晋时代,下限止于中唐。

南京老虎山东晋墓发现完整的泥钱(原称歪钱)10枚,色白似石灰,形与五铢钱近,但比真钱厚三倍,无字,分布男棺内石灰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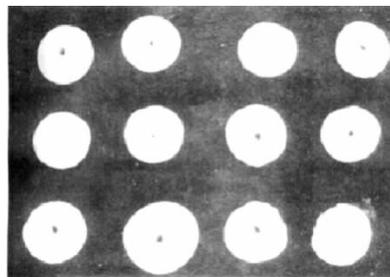
甘肃高台县骆驼城1号墓后室地面散布陶冥钱,具体细节不明。

陕西咸阳头道塬十六国1号墓泥钱(报告称为泥饼)4枚,中间有孔,直径2.5、厚0.8厘米。

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16号墓泥钱4枚,中间一小孔,直径2.6厘米。

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墓有泥钱32枚,捏制,圆形或椭圆形,扁平或者面微微弧形凸起,中间一小圆孔,直径2.7~3.8,厚0.3~0.5厘米(图一)。此墓墓志有天保二年(551年)纪年。

洛阳涧西区二处墓葬发现泥钱,均在79号墓在墓室西端一角,约60枚,制作较为工细,中心穿小孔。80号墓约30枚,仅成泥饼状,象征铜钱。79号墓砖墓志有北齐“天统五年”(569年)纪年,相邻的76号墓有武德八年(625年)墓志,估计80号墓为隋唐时期墓葬。



图一

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304号唐墓为垂拱四年(688年)墓葬,出土30余件泥钱,直径约2厘米^①。

考古发现魏晋隋唐泥钱不用模具制作,皆用手捏制而成,不甚圆整,大小不同,厚薄不均,大多偏厚,有的中间微凸,大部分不穿孔,即使穿孔也是随意地刺个小孔,状如针眼,不是方形的钱孔,钱面均无钱值,也不染色。泥冥钱都是临时随意制作,从马虎的态度推知当事人并不十分重视。而楚、西汉的泥钱大部分是模制,钱面的文字、孔与真钱接近。泥金饼使用金箔、银箔、包金以及着色处理,都是追求仿真效果。魏晋以来的泥钱与楚汉泥钱相比,简陋粗糙,只具象征意义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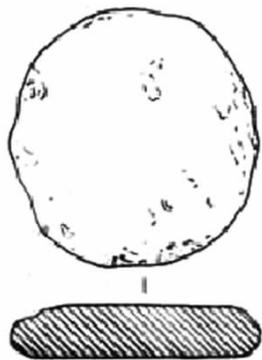
泥钱的消失主要是风俗的变易,泥钱随葬是旧俗。北朝崔氏墓地16号墓和崔芬墓都出土了泥钱,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现象。秦汉以降,清河崔氏为著名的高门望族,累代簪缨,家世源远流长,虽经丧乱依然保持了汉代以来的中原旧俗,泥钱随葬是家族传统之一。以这个阶段的后半期,即南北朝的后期,理论上有个分水岭。此前纸钱尚未出现,泥钱的衰落依然是自身的衰败,应该与纸钱无关,此后纸钱出现,或多或少地挤占泥钱的空间。纸钱冲击下,泥钱入葬少了,但是并没有绝迹。

纸钱问世之后,它的优越性渐渐体现出来,不仅材料来源广泛,而且比泥土更加容易加工、更加清洁。尤其重要的是它既可以像泥钱一样随葬,又能通过焚化送达地下或诸神。后面一点意义非凡,焚化是西方佛教带来的宗教礼俗,纸钱能很好地适应日益兴盛的佛教,是它最终取代泥钱的主要原

因。《旧唐书·王玙传》载,开元末,王玙为御史,充祠祭使,“每行祠祷,或焚纸钱祈祷福佑。”中唐时期纸钱由民间风俗变为皇家礼仪,纸钱已经风靡世俗,成为风俗中最活跃的场面。这个时期的小说笔记中记载了大量纸钱题材的鬼怪故事,地下的官吏利用各种手段猎取数额巨大的纸钱,积累冥间财富,把虚拟世界的幻象演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纸钱主要用于焚烧,入葬不多,且又不容易保存,所以考古发现很少。除了吐鲁番高昌、唐代墓葬陆续发现过一些纸钱外,内地很少发现。江西德安的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周氏墓,伴随其他纸质明器一起出土的纸钱,装在荷包之内,有的有卐字,保存完好,这是一个重大发现^②。

中唐以后的墓葬中泥冥钱罕有发现,其形制亦大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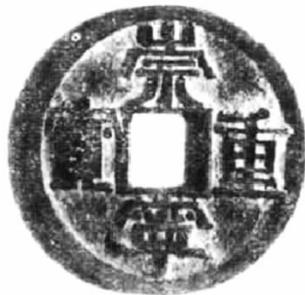
西安西郊枣园25号晚唐墓发现2枚泥饼,捏制,未烧,涂白衣。其中一枚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置于棺内左手位置。直径4.5、厚0.9厘米;另一枚残(图二)^③。这个泥饼的直径远远大于铜钱,外表故意涂白,可知它不是仿制铜钱而是仿制银饼。唐人把银饼作为资财收藏是有例子的,西安何家村窖藏中丰富的金银器中,



图二

就有大小22枚银饼。枣园25号晚唐墓泥银饼体积小于何家村的银饼,或恐是象征意义,或恐是唐代银饼本来大小不一。

宋代以来的墓葬,山西汾阳东龙观5号金代墓出土泥钱是唯一公开报告的发现。发掘报告没有文字方面的介绍,只供了彩色照片,得以大致了解概貌。泥钱共13枚,形圆,中间有圆孔,分大小两种,大者钱文为“崇宁重宝”,小者为“大定通宝”^④。



图三

东龙观5号墓金代墓泥钱做法是先捏制钱的泥坯,再以铜钱为模,模印成形。用作钱模有两种钱,一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铸造崇宁重宝,一钱当十钱(图三)。崇宁

三年(1104年)废小平和当五钱,专用此钱。大钱虽大,但与普通钱相比,含铜少,重量轻,引起了经济动荡。另一种是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铸大定通宝,大定通宝仿宋

徽宗大观钱,字体与瘦金体相似,制作精良(图四)。泥钱由真钱压制钱面,外观逼真(图五)。真钱压制的泥钱上面是反字,这点并不影响泥钱的“使用”,古代墓葬用字就有反书、倒书的习惯,



图四

所以钱文反转并非缺陷。墓内买地券有“明昌陆年”(1195年)纪年,金章宗明昌年间也发行过明昌通宝,质量上乘,精美如大定通宝。当时丧家不用明昌通宝,而选用大观钱、大定钱,不只是因为这些钱的钱身大、或者铸造精,可能是本朝新钱在观念上不宜制作泥钱的缘故。在唐宋以来的文献很难找到有关使用泥钱的记载。我们不能明白在纸钱称为唯一冥钱之后,为何用了还要用泥钱,泥钱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苏轼的《黄州寒食诗》中“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此“纸”是指纸钱,不过他却保留了一则泥钱传说。“陈昱被冥吏误追”故事中说:陈昱被冥吏误抓,在冥间“昏黑如夜,极望有明处,空有桥,榜曰‘会明’。人皆用泥钱。”“又见一桥,曰‘阳明’,人皆用纸钱。有吏坐曹十余人,以状及纸钱至者,吏则刻除之,如抽贯然”^⑤。



图五

这段话恰恰说明了泥钱和纸钱的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佛教传入了地狱的概念,冥间也有深浅不同地域,不是全部用纸钱,这恐怕就是5号金代墓葬埋入泥钱的原因。

5号墓墓道内土坑,出土买地券、地心砖、陶瓶、泥钱、墨、砚台。泥钱存于陶瓶内。买地券云“谨用钱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无疑这十几个泥钱就是象征“九百九十九贯”,九百九十

九是个惯常的数字,在南北朝以来的衣物疏中经常可以见到,是用来“买地”的钱费。不过这些钱似乎不足应付墓神、道路诸神、掌吏使者等,所以还有“五彩信币”这个信币是钱帛一类的东西,它不是直接带入墓穴,而是承诺以后通过烧化的方式付讫,这里显示了泥钱和纸钱的不同用法,大有意味。元明以来泥钱完全从中国风俗中消失,湮没无闻,东龙观金代墓葬的泥钱很可能是先秦流传下来的泥钱制度的最后的一个实例。

可以认为,楚汉以来的泥钱制度到中唐基本结束了,这种制度延续了十个世纪,而彻底结束要到宋金时代,又延长了四个世纪。如果以高昌建昌二年(556年)纸钱产生始,到东龙观5号墓金代墓“明昌陆年”(1195年)泥钱计算,泥钱和纸钱的交叠过渡期竟然长达六个多世纪。

注释:

张俊民:《武威旱滩坡十九号前凉墓出土木牍考》,《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县骆驼城墓葬的发掘》,《考古》2003年第6期。

马雍:《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时期文书概述》,《文物》

1986年第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县道墟十六国墓葬》,《考古》2005年第6期。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五年洛阳西工区北朝及隋唐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6期。

②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清理简报》,《文物》1990年第9期。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西郊枣园唐墓清理简报》,《文博》2001年第2期。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物旅游局:《2008年山西汾阳东龙观宋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

⑤ 《东坡志林》(卷三),第53页,中华书局,1981年。

(上接第92页)

其用途》,《文物》1985年第4期。c.考古所内蒙工作队:《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⑥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⑦ 张文彬:《双江新石器文物》,《民族调查研究》1984年第2期。

⑧ 王培新:《吉林延边出土的环状石器及其用途》,《文物》1985年第4期。

⑨ B.Blackwood,The Technology of a Modern Stone Age Peopl in New Guinea, Oxford,1950,PP.34-36.

⑩、⑪ 成东、钟少异编著:《中国古代兵器图集》,第1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第105~11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⑬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第5期。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第60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第9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⑯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⑰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⑱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畝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⑲ 吴玉贤:《从考古发现谈宁波沿海地区原始居民的海上交通》,《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⑳ 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著:《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82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㉑ 郑志林:《从河姆渡文化看萌芽状态的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㉒ 傅起凤、傅腾龙著:《中国杂技史》,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㉓ 马宝光:《简论古代儿童体育玩具——友》,《中原文物》1986年第4期。



本期导读

孙机先生《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一文进一步讨论了铜奔马的年代问题。武威雷台发现了一整套由铜车马和骑马俑组成的出行仪仗,铜奔马是这套仪仗中的一件。铜马昂首嘶鸣,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附着一振翅飞翔的燕子,飞燕回首惊视,骏马已经超越在前。古代传说的天马行空的壮丽景象再现人间。铜奔马优美姿态与精湛的工艺举世瞩目,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铜奔马出土以后受到考古界的重视,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对于铜奔马的年代,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孙机先生充分展示了争议各方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其主张自然清楚了。孙机先生著述十分丰富,成就卓然,是当今古代器物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方法、治学思想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顾莉丹、汪少华先生《说“珽”之形制》一文论述一个古代的重要礼器“珽”,“珽”也叫大圭,因为事关皇家礼制,因而历来重视。文献所见之“珽”,始见于《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方如椎头”说法解释“终葵首”为方形,传统的大致承袭此说。《新定三礼图》据此给出了方头略似榔头的图形。但是这种形状的圭从未见于考古发现,传世文献记载常常与考古报告相背,引起对传统文献内容的怀疑和轻视,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问题出在对于“椎”的描写,考古出土的椎首常态是圆柱形、椭圆形或腰鼓形,而非方形,虽然有平首圭,形制亦与经学家所说不同。本文在正确释读传统经学文献后,作出了合理的训释。同时调查了大量考古实物、汉代画像石图形资料,给人以较为可信的结论。

陆锡兴《汉魏以来之泥冥钱》一文论述了汉魏南北朝到唐宋的泥冥钱问题。泥冥钱在战国、西汉曾经盛极一时,考古发现的实物有相当数量,因为其年代久远,形制繁多,早就引起注意,不乏专门论述。东汉以还的泥冥钱,发现得少,制作简陋,并没有得到重视,至今尚属空白。其实这个阶段是冥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经历泥质向纸质转变的环节。因为泥冥钱出于考古发现,纸钱多见于传世文献,其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两个材料来源不同的冥钱却被分割为考古学和民俗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这段考古资料的梳理,不仅指出了泥钱的消亡期和纸钱的发生期,而且探讨了兴衰的原因。作者在冥钱史的探索方面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本文在内,基本上完成了各个时代、各个环节的研究工作,为撰写《中国古代冥钱史》准备了较为完善的基础。

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各个考古发现具有静态的、个别的特点,历史文献可以提供考古发现的背景等大量的信息,能把考古发现的器物串连起来,形成完整面貌,甚至全面的发展过程。所以对于器物的通史研究必须文献与实物并举,这是一个铁定的法则。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辨别、正确认识的问题,以上两者也是如此,孙机先生和顾莉丹、汪少华先生的文章都做到了这点。

(陆锡兴)